

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

邵 軒 磊^{*}

摘 要

近代日本對中國研究在方法論上的突破，在於建立「東洋學」，首次以實證方法研究中國，並成為面對當時現實中國主要的知識來源；但另一方面，對於東洋學之特色以及其評價，在學界卻產生數種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意見。本文試圖回溯其思想源流並且藉由知識系譜（disciplinary genealogy）的方法，對其學科的誕生與演變重新反思。本文分別討論「儒學到東洋學、東京／京都學派、學科講座建立、國策調查方法」等等子題；發現東洋學在觀念史的意義上，主要的變遷動力為「學科現代化／全球化、學術群體、近代國策需要」。本文並提出東洋學的建立，放在將「中國他者化」的延長線上，有作為「對象物與對照物」兩種他者典範，這兩種典範在戰後分別成立了不同的研究理念（問題意識）系譜，也造成現今學者對此一學科的各种分歧觀點。

關鍵詞：中國研究、日本、知識系譜、東洋史、漢學

^{*} 作者現任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Ideology and Knowledge Genealogy of Pre-war Touyoushigaku (Japanese Sinology)

Shao Hsuan-lei

Abstract

The major change of modern China-studies in Japan is the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of “Touyougaku (Japanese orientology)” as its cognitional methodology. It is the first discipline which adopt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pproach to “China.” Hence, it became the main source of knowledge of “real China” in that era. On the other hand, the opinions on Touyougaku’s historical value are quite different and even conflicting. This paper declares that we should trace back to the knowledge’s origins and study its pedigree (disciplinary genealogy). It focuses on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in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of Touyougaku, which are “discipline 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 academic groups interaction, and policy request.” and analyzing Jugaku (Confucianism) source, Tokyo/Kyoto school, the seminar establishment, and policy survey. It also proposes the Touyougaku makes China as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under which forms the sub-paradigm of “object” and another sub-paradigm of “collation.” The two various paradigms develop different theory models in post-war, which cause scholars to

maintain different views in Touyougaku.

Keywords: academic community, China-studies, genealogy, Japan, knowledge, Sinology.

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

邵 軒 磊

一、研究背景與文獻回顧

從明治中期開始，日中開始密集的接觸，對現實中國認識的需要也隨之而生，誕生了一整套對現實中國重新理解的方式。這種方式，吾人可以東洋學（Touyougaku, Japanese Orientalology）來概括稱之。¹因此，本文試圖以觀念史角度，闡明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並論及日本如何透過東洋學觀念，把中國作為實證的研究對象。

明治中期之後，建立「大學」，引進現代學科制度，東洋學也漸漸成為系統性認識中國、亞洲的主流學科。研究者原覺天認為東洋學的創立動機，是日本西化建設的一部份。²但隨著日本國力增長，「只有東洋人而非西洋人才能真正瞭解東洋」這種呼聲，在學者間也產生與西方研究分庭抗禮的雄心。³隨著昭和前期的擴張，因此也導出

* 本研究為國科會研究計畫「中國研究方法的再思考：以東洋文庫學術系譜為例」（計畫編號：NSC:99-2811-H-002-035）之研究成果，特此誌謝。

¹ 本文並不否認，在江戶時代，甚至更早之前，日中之間即有交流往來。將「中國」作為一個具體的對象物，全面開展物產、經濟、地理等等的理解需要，從而建立另一套不同於以往的理解脈絡，吾人將之概括稱為「東洋學」。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爬梳此一學術方法在「觀念史上」的意義。

² 「一面對當時的普遍化的需要上，對（亞洲）特殊性的摸索。要瞭解遲發的亞洲是一種命定的結果還是可能被改變的心情。」參見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頁4。

³ 「西洋人對於西洋的事情能夠瞭解，但是並沒有在感受過東洋，所以不能理解東洋的事情。雖然注重人類一般的通則，但是西洋人的理論有很多錯

了「亞洲蔑視觀」。⁴戰後，學者旗田巍稱其為「缺乏人性」的學術。⁵安藤彥太郎甚至指出東洋學連結到近代化史觀，對中國發展有偏見，東洋學者無法真正理解中國。⁶中國學者王屏的立場更加批判，提出「日本東洋史學是用以發揚國威的一門學問。」而且認為這種學問完全是為日本的國家利益服務的。⁷以上這個脈絡，就是強調東洋學的民族文化主義成分。

另一種研究「東洋學」的方式，是強調這個學科的「方法論」。主要思維是「要考辨歷史文獻的真偽，探明歷史事實的真相，解釋歷史事實的成因及因果關係。」在東洋史的觀念中，歷史著作不重在帝王將相等特殊個人榮辱問題，而在於從社會群體的變遷中，考察歷史變動的方向，從而揭示其歷史規律性。學者認為，這是現代史學的根本長處，也是東洋學對於傳統漢學的脫胎更新。⁸總和以上的討論，東洋學在觀念史上的意義為：一、日本人意識到要把中國歷史作為一門外國史來對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二、在世界的範圍內，以中國

誤。吾人不能無視東洋的歷史地理狀態，以及各種複雜的因素，僅以片面來瞭解東洋。所以東洋學者的第一要務正是開拓此一未開的分野，這不只是為了解東洋的事情，更是由此瞭解人類真實的樣態；吾人東洋學者雖然是跟隨著西洋而討論此一議題，但是目標就是要導正他們（西洋人）所理解的世界史。」參見和田清：〈東洋学のために〉，《學術月報》，第7卷第7期（1954年10月），頁395。

⁴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4。

⁵ 原因在於，東洋史學的考證研究，造成了學界與一般大眾對於中國古文明的不信任與崇拜「偶像」中國人的蔑視。參見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傳統〉，收於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年），頁220。旗田雖然並不直接認為學術是為政治侵略服務，但是也提出了因為「學究性格」而使自身學術研究用於侵略用途，也就等於東洋史學是「缺乏人類存在」的學術。參見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傳統〉，收於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頁212-213。

⁶ 安藤彥太郎：〈中国研究の問題点〉，收於安藤彥太郎編：《日本人の中国観》（東京：勁草書房，1971年），頁93。

⁷ 王屏：〈論日本人的中國觀的歷史變遷〉，收於蔣立峰編：《中日兩國相互認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174-191。

⁸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9。

歷史爲主的東洋史。是與西洋歷史相對應世界史的一部分；三、標誌著文化教育界和學術研究者的關注對象，已從古典的傳統中國轉向於現實東洋世界。⁹ 也有學者指出「白鳥庫吉／橘樸」兩者分別代表兩種對東洋史的研究面向，分別是「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¹⁰ 以上這些學者強調東洋學方法論之科學性與進步性。面對種種對東洋學的不同評價，茲將以上學者觀點整理如下表：

表一：學界對東洋學評價一覽表¹¹

年代	作者	東洋學主要特色	主要評價
1954	和田清	以理論找出主要因素的精神	能真正認識中國
1966	旗田巍	考證研究、實證研究	對現實中國無關心
1971, 1966	安藤彥太郎、里井彥七郎	依近代立場批判東方社會	不能瞭解中國，帶來蔑視觀點、成爲侵略的心理基礎
1984	原覺天	瞭解日本自身發展可能性	雖然與侵略行爲同時，但關係不明。
2003	王屏	伴隨日本侵略亞洲而誕生（茁壯）	實際爲侵略者做事
2006	錢婉約	近代西方學科制度	正視現實的中國、能促進與中國來往

簡言之，上述立場可大約分爲兩類，其一是從東洋學的性質、立場與歷史結果中，推論出東洋學與戰爭行爲同時發展，所以東洋學作爲一種觀念史的階段性產物，也具有相當的民族主義色彩，應該有歷史責任甚至必須揚棄；第二種研究是單從學理上描述東洋學的由來與

⁹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29。

¹⁰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頁1-46。

¹¹ 此表爲作者自製。

特色，並強調東洋學的「科學」與突破性。從表列中可以看出，這兩種方式的研究也造成對整體東洋學的評價差距甚大。在以上日中雙方學者從東洋學從起源到評價都有不同見解的情形下，對於東洋學的再思考有其必要。綜觀來看，兩種立場都並沒有提及東洋學的整體知識體系位置與變化，也就是說，「認識現實中國」這個行為本身產生了什麼樣的意義？事實上，在戰後到70年代之前，主要關心社會主義中國，甚至從事相關社會運動的學者，也是以東洋史學者居多，這個現象應該如何解釋？

關於知識框架部分，現今已有以「他者／主體」二元對立的模式，來理解日本近代文明史中的「中國觀」。包括陳瑋芬強調主客體的文本解讀，討論日本東洋學的中國觀念。¹² 以及石之瑜歸納日本近代亞洲知識的框架，指出「日本必須對中國採取完全切割中國或是調教中國成為標準國家的策略」，¹³ 也就是中國作為日本的對照物，提供日本知識分子經由學習了西方的現代主義論述，提供日本學者審視自己過去的落後文明時的內在意義。白永瑞更把韓國京城大學的東洋史制度與當地（朝鮮）知識份子的心理認同互動做出考據，有著類似的看法。¹⁴ 上述從後現代角度分析的論文，提供了學術史「他者研究」層次，把知識史、觀念史模型延伸到自身文明的內在需要，從每個東

¹² 陳瑋芬：〈自我的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與「支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2001年3月），頁385。

¹³ 石之瑜、高國鼎：〈作為異己的主權中國——東亞本體論的可能性與可能性的東亞本體論〉，《政治科學論叢》第15期（2001年12月），頁4。有論者指出西方將中國國家行為看成是主權世界中的一個異例。如各種西方之中國研究者對於中國的看法，不盡相同，如 Lucian Pye 稱中國作為國家是偽裝出來的結果。Samuel Huntington 辯稱儒家為文明衝突的來源。根據同樣的思考脈絡，Edward Friedman 指責中國民族主義阻擋了中國的民主前景。參見石之瑜、高國鼎：〈作為異己的主權中國——東亞本體論的可能性與可能性的東亞本體論〉，頁2。

¹⁴ 白永瑞：〈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9期（2005年9月），頁278-283、269-294。

洋學知識分子對西歐文化的自省出發，將研究成果反映在對日本主體的認識上。

本文立基於以上著作，試圖追問的是：這兩種研究方法，在東洋史學上是什麼樣的關係？而要怎麼解釋東洋史作為方法論的學科總體位置？準此，本研究想更進一步，檢驗「他者研究」如何具體在中國研究中的呈現，並且將東洋學連結到二戰結束之後（1945）對整個中國研究的影響。為此，本文的焦點放在，以觀念史角度來觀察東洋學的變化，從方法論、研究主題、研究理念中可以看出，因應日本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日本知識體系一步一步逐漸將中國空間化與對象化的過程。必須在前言提及的是，在東洋學本意是研究所有「亞洲」的學問，依照現在的分類，有文史哲、美術、思想、考古等各種分科。其中因為學科的因素，而且也史觀部分較能看出日本特色，因此在本文中，筆者把重心較為放在對東洋史學的討論，其餘部分作為補充之用，請讀者諒察。原因在於，東洋文哲學主要繼承了儒學、支那學和歐美漢學的研究方法，¹⁵ 雖然研究對象上，也發展出對漢文化、中亞、西藏、蒙古、滿洲等研究，¹⁶ 但研究核心還是與傳統儒學相近，以經典為主。¹⁷ 詳細的討論，會在下節詳述。

二、東洋學與傳統儒學——從分裂到論爭

在既有研究文獻之中，東洋學共可分為四期：黎明期、日清戰後

¹⁵ 以內藤湖南式的研究為代表。青木認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東洋學更接近「歐陸漢學」(sinology)。東洋學是以東洋（除了西南亞之外的全體亞洲）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其中範圍不只有文化科學更有自然科學。參見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東京：螢雪書院，1940年），頁4。

¹⁶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6。

¹⁷ 東洋文哲學主要研究的議題請參照東方學會（1947年成立），網址：<http://www.tohogakkai.com>；或日本中國學會（1948年設立），網址：<http://nippon-chugoku-gakkai.org/>，檢索日期：2012年12月1日。

到明治末年、大正時期、昭和時期，¹⁸也有其他的研究分期。¹⁹如前所述，現代中國研究的各種系絡之中，以「東洋史」為主要的研究主軸方法與學問，本節茲將東洋學戰前的發展狀態加以簡介。

到德川時代為止，主要以儒學的世界觀為主軸，延伸出朱子學、陽明學、國學等政治思想。²⁰這種思想源流主要具有「經學」性格，不算對現實的國情研究。²¹簡言之，是在研究「秩序、道德、文化」的時候，也把這個理念認為是普世一致的，表現出當時中國與日本共享一種文化體系。直到1872年，明治政府頒佈了近代新學制之後，以漢學為中心的傳統學問知識體系也受到嚴重打擊。²²隨後，1887年東京帝國大學設立史學科，延請德國蘭克（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學派學者里斯（Ludwing Riess，1861-1928）創建，主講西洋史學理論及西洋歷史。蘭克學派講求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認為史學研究就是要通過對於歷史資料的考證，探明和闡述真實可靠的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1889年，政府使用「近代史學方法」來編撰國史，奠定了其經典地位。²³

¹⁸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發展》，頁146。

¹⁹ 也有其他的分類方法，如分為：1、明治初年到明治二十二-二十三年；2、到明治三十年；3、到大正四年；4、到昭和七年。參見小倉芳彥：〈日本近代史学の再探討〉，收於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卷30，頁481；以及王屏分為五期：第1期明治前半期（1868-1888年）。第2期明治二十-三十年代初（1888-1900年）。第3期從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1900-1914年）。第4期從大正初期到昭和初期（1914-1930年）。第5期從昭和初年到二戰結束（1930-1945年）。參見王屏：〈論日本人的中國觀的歷史變遷〉，收於蔣立峰編：《中日兩國的相互認識》，頁174-191。

²⁰ 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

²¹ 安藤彦太郎：〈中國研究の問題点〉，收於安藤彦太郎編：《日本人の中國觀》，頁88。

²²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5。

²³ 1889年，由重野安繹主持「修史局」，負責編纂《大日本編年史》，修史局即以「編年史編纂掛」的名義直接隸屬於帝國大學。為此，在史學科之外，特設「國史學科」，主要講授日本歷史的課程，兼授中國歷史的課程，正式成為國家編制。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5。

近代史學方法意味著對「某一限定空間進行客觀研究」，把史學分爲：東洋史、西洋史、日本史三部。這樣的改變表示日本知識界試圖把之前以漢文明做爲「中心」的思考模式，轉爲提出全亞洲民族綜合觀點，也就是以「區域」作爲分類之基礎。²⁴1894年起，擔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的那珂通世在中等學校教科課程調查委員會上，提倡中等學校應成立「東洋史課程」開始。此後市村瓚次郎的《東洋史要》，²⁵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²⁶那珂通世《支那通史》、²⁷市村瓚次郎與滝川龜太郎合著《支那史》²⁸等教科書發行後，逐漸成爲固定形式。²⁹同時，由於日本學者在之前的漢學文獻基礎，很快的就被國際學術領域所接受。1899年羅馬召開萬國東洋學會，白鳥發表了有關語言學的論文，開始與國際學界接觸。1900年，以上田萬年、高楠順次郎爲中心研究者，成立印度研究爲主的帝國東洋學會，並廣泛與歐陸漢學界展開交流。³⁰

就學科建制而言，東洋學起源於東京大學文學部的第一科與第二科：第一科爲史學、哲學、政治學；第二科爲和、漢文學科。其中東洋文哲學被安置在第二科（和漢文學科）中，僅辦了兩屆就停止

²⁴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48。

²⁵ 市村瓚次郎編：《東洋史要》（東京：吉川半七出版社，1897年）。

²⁶ 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東京：大日本図書，1898年）。

²⁷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東京：中央堂，1888年）。由於那珂是以漢文寫作，因此較爲通行的是和田清將其翻譯成爲昭和13年版的日文版本。參見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47。

²⁸ 市村瓚次郎、滝川龜太郎：《支那史》（東京：吉川半七出版社，1888年）。

²⁹ 安藤彦太郎：〈中国研究の問題点〉，收於安藤彦太郎編：《日本人の中国観》，頁90。其他的文獻中也指出：東洋史這個名稱，是來自於1894年那珂通世的提議。參見小倉芳彦：〈日本近代史学の再探討〉，收於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世界歴史》，卷30，頁479。

³⁰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50。

了。³¹主要的特色，就是將學術視為實證學問，³²而非單純的「取仕之途」。³³總的來看，從學科出身，文哲學就與史學有很大差異。自此東洋史學開始進入大學成為「學科」(discipline)，之後1906年京都帝國大學設置文科大學，1907設歷史學研究會。早稻田在1908年設歷史學科；慶應大學在1910年設立史學會，次年設立史學科，³⁴這些史學科、史學會都使用德國實證史學教學。³⁵

為什麼以「東洋」為名？在地理範圍上，東洋泛指整個亞洲，指以古代中國為中心，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東亞各民族各地區，並不包括日本，³⁶但在中文語境中，「東洋」或指某一東方海域，或者就是指日本。³⁷從日本與中國對於東洋的觀念完全不同看來，日本的「東洋

³¹ 許多傑出第一代的研究者，包括「市村瓚次郎、林泰輔、瀧川龜太郎、岡田正之、中途退學的西村天因，後期生中有兒島獻吉郎、長尾愼太郎等，都成為著名的學有專攻的中國學家。」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13。

³² 「支那古典講習科」雖附屬於文學部，但在辦學經費、學生報考、授予學位等方面，都是不同於東京大學其他學科的。首先它的辦學經費不在大學預算之內，須每年另外設法謀求。在學生報考方面，由於規定入學考試不必考英語，入學以後也一概不必聽用英語講授的課程。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11。

³³ 町田三郎在其《明治漢學者》提及：古典講習科已經脫離了以往漢學「左國史漢」與「和漢詩習作」的舊例，而是以新攜來的《皇清經解》為中心的純粹學者型的實證學問。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18。

³⁴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52。

³⁵ 藤井讓治：〈三浦周行〉，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會，2002年），頁52-53。

³⁶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24。

³⁷ 所謂東洋(Orient)一詞地理範圍並不十分明確。在古代西方社會，它主要指現在的近東(西亞)而言，即小亞細亞、波斯、埃及，而印度、中國則另外稱呼。東洋一詞最早散見於宋書之中。在中國人眼中，東洋除作為地理概念外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最初，在利馬竇與中國人編制的世界地圖上，「大東洋」與「大西洋」同指單純的地理位置。明朝人張燮著有《東西洋考》，其中有「東洋航線」與「西洋航線」的記載。東洋航線的起點在金門，終點在汶萊，東洋航線指出金門一取澎湖一達呂宋島一再南下到爪哇群島或汶萊北岸的航線。後來，東洋航線沿岸就被稱作東洋。其中，東洋的地理位置雖然包括在後來的東洋概念之中，到了近代，中國人多稱日本、菲律賓、汶萊北部為東洋，尤其視日本為東洋。總之，東洋的

觀念」顯然就是繼受歐陸漢學。³⁸ 東洋的意義也就承襲歐陸漢學，意指歐洲東方之陸地，大致上是指亞洲，但是要理解西亞或中亞，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十分勉強。且當時的學術編制來看，研究西亞與中亞的人，相較於現在或是其他領域來講是十分少的。³⁹ 因此本文認為，與其說此時就能預見要為侵略亞洲做準備，或是以「東洋／西洋」的對抗性思考。⁴⁰ 不如說只是單純的模仿歐陸學制的結果。在文化意義上，有論者認為白鳥使用「東洋」這個概念，把儒家思想與孔子提升為整個東洋的文明，把日本的文化負債關係轉化成中日雙方平等的關係，⁴¹ 也是東洋學的一種意義。

開創初期，東洋學與漢學者間有數個大論爭。白鳥庫吉研究指出中國古代的帝王（堯舜禹）並不存在開始，稱為「堯舜禹抹殺論」。⁴² 白鳥以此與漢學家林泰輔展開論爭，確立了東洋史學的地位，漢學方面自此衰弱。⁴³ 簡言之，就是在文獻上並無記載，從而推論否定中國古代史中相當程度並非信史。自此，東洋史學者展開了大正年間

方位大體指廣東東南部的菲律賓、馬來群島及汶萊東部，後來其範圍進一步擴大到東北部，包括臺灣、日本，尤其日本常被稱作小東洋。但在日本情況卻與此相反，東洋與西洋這兩個單詞分別是從 Orient 與 Occident 翻譯過來的。參見王屏：〈論日本人的中國觀的歷史變遷〉，收於蔣立峰編：《中日兩國的相互認識》，頁 174-176。

³⁸ “Sinology”，在現代日文多以假名「シノロジー」表現，早年多譯為「東方学」或「漢学」。

³⁹ 即使是戰後，東洋學也只包括「日本、中國、印度、朝鮮等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其次有西伯利亞、蒙古、東南亞、西南亞等」。參見仁井田陞：〈我が国における東洋学研究的特色—東洋文化研究所〉，《學術月報》第7卷第8期（1954年11月），頁475。

⁴⁰ 可以說，這種西洋、東洋的兩分法，代表了當時日本人意識中世界文化的兩大陣營。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24。

⁴¹ 轉引自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6年8月），頁4。

⁴² 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の研究〉，《東洋時報》第131期（1909年8月）。

⁴³ 安藤彥太郎：〈中国研究の問題点〉，收於安藤彥太郎編：《日本人の中国觀》，頁90；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傳統〉，收於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頁219。

對「中國古典」的一連串否定風潮。⁴⁴ 由於東洋史學創立者白鳥庫吉與那珂通世，是福澤諭吉的門人，也同時受到歐洲史學影響。之後白鳥的門生，津田左右吉也是致力於批判中國文獻的不合理處。福澤、白鳥（那珂）、津田的系譜，可以代表東洋史學以歐洲的理性主義為基礎的東京學派。其他的論爭也僅介紹如下：有飯島忠夫以漢代曆法考證「左傳偽作論」，與新城新藏發生論爭；1911年，加藤繁聲稱井田是後世假造，挑戰服部宇之吉「井田私考」一文。⁴⁵

表二：戰前主要有關論爭一覽表⁴⁶

洋史方主張	東洋史方代表學者	漢學方代表學者
堯舜禹不存在論	白鳥庫吉	林泰輔
左傳偽作論	飯島忠夫 ⁴⁷	新城新藏
井田偽造論	加藤繁 ⁴⁸	服部宇之吉 ⁴⁹

雖然當時，論爭多以東洋學者稍佔上風結束，但戰後有學者認為認為「對中國古傳說的否定不只是拒絕相信傳說，連帶的是否定（甚至輕侮）依照這種傳說所生成的中國人的思維樣式，甚至是整個中國文明。」⁵⁰

⁴⁴ 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傳統〉，收於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頁219。

⁴⁵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58。

⁴⁶ 此表為作者自製。

⁴⁷ 飯島忠夫：〈漢代の曆法より見たる左伝の偽作（1）〉，《東洋學報》第2卷第1期（1912年1月），頁28-57；飯島忠夫：〈漢代の曆法より見たる左伝の偽作（2）〉，《東洋學報》第2卷第2期（1912年2月），頁181-210。

⁴⁸ 參見加藤繁：《支那古田制の研究》（東京：有斐閣，1916年）。

⁴⁹ 參見服部宇之吉：《支那研究》，（東京：明治出版社，1916年）。

⁵⁰ 安藤彦太郎：〈中国研究の問題点〉，收於安藤彦太郎編：《日本人の中国観》，頁91。

三、京都學派

另一個常為讀者提及的是「京都學派」。在京都大學，東洋文哲學與東洋史一直並稱「東洋學」。在1997年京大百年紀念的《京都大學百年史》一書中，東洋學者包括內藤湖南、狩野直喜、桑原隲藏、羽田亨、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⁵¹ 因此，可以發現最初的「京都學派」學者有：支那文哲學的狩野直喜（君山）、國史學的三浦周行、東洋史學的內藤湖南。⁵² 以狩野直喜為例，主要目標放在以哲學、史學、文學為中心，開設「支那學科」，雖然這個目標並未完全實現，但是狩野的學問以此三分野為核心目標。⁵³ 因此1906年「東洋史學講座」最早在京大實踐，較東京方面晚了約十年，雖然名稱相同，但是當時京大的「支那學」分為哲學、史學、文學三個部分，因此東洋史學講座也分別在三個學科成立。⁵⁴ 史學科由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為首、富岡謙藏、桑原隲藏、濱田耕作、羽田亨等博士⁵⁵ 共同任教，主要的講座內容是：人口問題、土地、農業財政、商業、貨幣史。⁵⁶ 以及對於甲骨學、文學藝術史等新的研究領域的開拓。⁵⁷ 1914年《史研》、1916年季刊《史林》發刊、京都支那學會（以狩野直喜、高瀨武次郎、內藤等京大教授為中心）的《支那學》在1920年開始運作、

⁵¹ 礪波護：〈序〉，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會，2002年），頁3。

⁵² 礪波護：〈序〉，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頁2。

⁵³ 山田利明：《中国学の歩み—二十世紀のシノロジー》（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年），頁74。

⁵⁴ 礪波護：〈序〉，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頁1。

⁵⁵ 從這份名單看來，包括了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教師，都納入了當時的東洋學範圍，這也是所謂的京都學派。

⁵⁶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12。

⁵⁷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20。這些學者後來以京都大學文學部為主要活動據點，包括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及後來的京大東南亞研究所發展，合稱「京都學派」。

三田史學會《史學》在1922年發刊。⁵⁸這段時間是東洋學最為蓬勃發展的時刻，其重心放在社會經濟史、考古學、思想史、南海史、西域史的發展。⁵⁹

雖然東洋史學則被稱為「史料實證主義」，但針對十九世紀末對於研究史觀與分期的變動，京都大的三浦周行提議「對於抽象的議論與分期的爭論暫時擱置，先蒐集史料才有科學的研究」。⁶⁰以狩野直喜、內藤湖南、富岡謙臧、岡崎文夫等人為代表，主張中國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不應分開來研究，而應該三位一體地構成支那學，中國史是支那學的一部分，稱為支那史。⁶¹根據錢婉約、並木賴壽、戶川芳郎、山田利明的研究整理，本文歸納出東京與京都學派有下列不同：

⁵⁸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65。

⁵⁹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84-185。

⁶⁰ 藤井讓治：〈三浦周行〉，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頁54。

⁶¹ 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34。

表三：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的區分⁶²

論者	京都學派 (歷史也要注重文哲研究)	東京學派 (歷史必須注重理論)
錢婉約 ⁶³	較多地保持與中國學者的聯繫與交流。(頁3、45-46)	明治以來主要傾向蔑視中國。(頁3、45-46)
	由清代乾嘉考證學發展而來。(頁48)重歸納、輕演繹。(頁50)	實證主義精神、主要來源於德國蘭克學派。(頁48)
	研究選題重個別史料，輕忽總體把握。(頁51)	重視理論、通史。
並木賴壽	注重繼承了漢學而創立的「支那學」。(頁3-4)	以實證史學對「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建立模型(頁3-4)
	研究同時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混亂狀況，將其視為長期中國史的一向傳統。	近代史與(當時的)當代史，但並不被認為是「學術的」歷史研究對象
戶川芳郎 ⁶⁴	使用大量日本人教師、並且也能接納非學術者(記者、田野調查員)。	東大由於是日本的第一所帝國大學，從教學體制到教員配製都大量倚重西方教育模式
山田利明 ⁶⁵	主要是歐陸漢學，特別是法國的東洋學有很深的聯繫。	主要是與歐陸史學為效法對象，特別是德國蘭克學派。

依照上表，吾人能對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有粗略的基礎認識。以下茲就京都學派之後的發展簡單說明。在對中華民國戰爭時期，東

⁶² 作者根據以上文獻整理。

⁶³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34。

⁶⁴ 戶川芳郎：〈漢學・支那學・中國研究〉，《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会會刊》1990年第4期。

⁶⁵ 在法國留學期間與 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 交好，此後京都大學一直有歐陸漢學的傳統。參見山田利明：《中國學の歩み——二十世紀のシノロジー》(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年)，頁74。

京、京都的東洋學學者共同商議成立了東方文化學院，分設東京研究所（1933）、京都研究所（1929）兩個研究機構，分別以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任所長。京都方面有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高瀨武次郎、松本文三郎、桑原隲藏、小川琢治、矢野仁一、新城新藏、石橋五郎、新村出、鈴木虎雄、濱田耕作、小島祐馬、羽田亨任評議員。由於京都方面遵照創設宗旨，堅持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東京方面則逐漸傾向於對現代中國的研究，兩所遂有分離獨立之議，終於在1938年分離。東京仍以「東方文化學院」為名，京都改為「東方文化研究所」，下設「經學文學、宗教、天文曆算、歷史、地理、考古學」六個研究室，以松本文三郎為所長。⁶⁶ 東方文化研究所併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文化學院併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成為文部省屬下的大學內的專門研究機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及其附屬的東洋學文獻中心，成為戰後京大中國學研究的主要機構。⁶⁷

一言以蔽之，京都學派的發展主張文史哲不分，也鼓勵研究者有中國生活經驗，因此從內藤以降的京都東洋史家，都主張親自到中國調查，建立親身體驗，在當時以大量的遊記、中國評論呈現出來。⁶⁸ 這些中國觀察者多以自身體驗寫作，甚至是以記者的身份來中國，在取向上傳統京都學派的學者與中國士人的交流較廣，對中國也較為友善。

四、調查與區域研究方法

日俄戰爭後，隨著日本國際實力的增加，向外擴張，進而在1907

⁶⁶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37。

⁶⁷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38。

⁶⁸ 請參考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於《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第2卷，頁1-178。其中採用了大量的日記、簡記隨筆之類的中國印象紀錄。參見內藤湖南著，王青譯：《兩個日本漢學家的中國紀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轉引自黃俊傑：〈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收於黃俊傑編：《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頁265-312。

年設置了滿鐵調查部。⁶⁹ 其主要的研究者群體，來自1905年白鳥庫吉提倡設立亞細亞學會、由平田男、伊東忠太等斡旋，1909年併入東洋協會，成立學術調查部，同年發行《調查報告》；1911年以調查報告形式為基礎，發行《東洋學報》，這是日本學界「調查報告」傳統的源頭。⁷⁰ 此時的東洋學研究的史蹟調查研究也相當豐盛，主要由京都學派學者擔任，伊東忠太、關野貞、桑原等人到中國特別是華北一代的旅行紀錄。⁷¹ 在陳慈玉的論文中，特別強調了此時所建立的實證調查系譜。⁷² 具體而言有日清戰爭時期「中國市場調查」、領有台灣後的「台灣舊慣調查（1903，1906）」、日俄戰爭後成立滿鐵東京支社中的學術調查部對於滿州與朝鮮作的歷史地理調查、爲了滿洲經營而作的「滿洲舊慣調查1914-15」，之後則是1939-1944年滿鐵調查部、東亞研究所、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共同作的「中國慣行調查」。⁷³

此時東洋學的目標是研究東洋（特別是中國）全部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宗教、哲學、文學、言語、民族、歷史、美術、地理，甚至法律、政治、經濟等組織的綜合文化研究，另外還及於對新領域的開拓與現在諸科學的總合等等，不只對於古代或近代，甚至表面的現象與時事解說都可以接受。⁷⁴ 以滿鐵、東研爲核心的研究機構，是當時的東洋史學者主要就職之處。自此，亞洲議題在日本社會的關心更高，東洋史學者多有投入此一研究。

⁶⁹ 伊藤一彦：〈日本の中国研究〉，收於安藤正士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頁5。

⁷⁰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52。

⁷¹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頁160-162。

⁷²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頁1-46。

⁷³ 末廣昭：〈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收於末廣昭編：《「帝国」日本の学知：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帝国」日本の学知》（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卷6，頁3。

⁷⁴ 仁井田陞：〈我が国における東洋学研究の特色——東洋文化研究所〉，《學術月報》第7卷第8期（1954年11月），頁476-480。

五、結論：觀念史層次上作為 中國研究源流的東洋學

大體而言，在東洋學觀念的演化系譜中，中國的價值被抽離而成為對象物，轉變為近代主權國家的現實主義邏輯。本文主張，作為觀念的「中國」，也隨東洋學的變化，在建立日本民族時逐漸成為「他者」。然而，吾人並不能認為這個歷程是與近代學術發展直線進行的，因為戰後「中國價值」又重新體現出來。因此可以假設，戰前日本對於中國的關照，是奠定於對日本自身社會國家發展對照而產生的。

在此一理解之下，本文試圖詳細論證日本學界「當代中國」的認識基礎如何被建立起來的過程，以「東洋學」為核心。並從「學術群體、學科近代化／全球化、近代國策需要」，三個方向呈現出東洋史戰前的演變簡史。本文試圖簡述東洋學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對於同時代中國的認識形式與評價？而這種評價如何被實踐？實踐的方法（學科）受是如何被規定出來的？本文試圖指出：從以上對東洋史的觀念的分期考據之中，可以發現在東洋學學框架中，依照把「中國」作為地理空間與歷史時間的想法，在觀念史中，東洋學的特色在於創造出兩個中國認識上的斷裂，分別是「時間與空間」。

（一）時間斷裂

綜上所論，可知東洋學作為「近代科學」的一個指標，其核心在於「建立整體史觀，用以評論儒學」。⁷⁵傳統的史學觀念，是以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思想為標準，並不注重歷史事實及文獻資料的考訂。比如日本幕府及藩國的學校曾長期襲用《十八史略》等作為歷史教科書，⁷⁶此書內容是對中國《史記》以來到元以前正史等舊史書的

⁷⁵ 安藤彥太郎：〈中国研究の問題点〉，收於安藤彥太郎編：《日本人の中国観》，頁88。

⁷⁶ 參見喬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響〉，《南開學報》2001年第1

選集。⁷⁷既然是「選集」，就意味著是作為片段的故事來看待，重點在於「正名分、明忠奸、垂鑒戒」，作為士人忠孝教育的一環，以天命與朝代更替來說明中國的歷史。反之，東洋史主要的方式是研究「通史」，用以挑戰「史略」，並建立客觀理論來瞭解歷史規律性，所以找尋客觀固定的觀察對象。

其次，東洋史學主要任務就是設法對中國建立時間序列的認識。在這些認識中，很多研究是伴隨到對日本自身的認識與發展，將中國做為日本發展的「對照物」來理解；同時，也把西方發展作為另一層次對照物。此即，東洋史學發展的原初問題意識之一，源自對歐洲帝國主義對日本殖民的恐懼。⁷⁸這種意識使得學者們急於尋找發展強盛的方法與軌跡。東洋史學之所以與儒學史學區隔，就是建立了通史與理論的觀念，以及說明發展樣態的線性史觀理念。此即「發展過程論」，尤其是模型式史學所研究的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從當時主要的學會組織也可以看出新舊學者分庭抗禮的整體樣態，東洋學會⁷⁹（以日本籍之東洋文哲學者為主體）與東洋哲學會⁸⁰（以歐洲漢學者為主體）兩者在對西方的態度上有很大不同。

期，頁 81-90。

⁷⁷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 27。

⁷⁸ 「為什麼亞洲諸國中，印度成為殖民地，中國是半殖民地，日本卻能獨立？」參見尾藤正英：〈歷史理論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第 81 卷第 5 期（1972 年 5 月），頁 509。

⁷⁹ 創設於 1886 年，由古典講習科教師內藤湖南倡議，學生市村瓚次郎、林泰輔、小中村義象、關根正直任幹事，成立東洋學會，旨在宣導東洋文化的研究。學會每月一次於東京湯島舉行演講會，該年 10 月並創刊《東洋學會雜誌》。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 25。

⁸⁰ 創設於 1888 年，學會每月舉辦一次演講會，發行《東洋哲學會叢書》雜誌，不久，曾因在政治上提倡「保守新論」，一度停辦。參見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頁 26。

(二) 空間斷裂

在觀念史上，空間的斷裂就更為明顯，任何東洋學的論文的首章，都是說明東洋的地理、生態，並以此作為歷史基礎。⁸¹ 相較於傳統日本研究中國時，僅限於文哲的理解，在東洋學講究「實證主義」的立場上產生突破。1935年後，滿洲鐵道部調查部門，其從業員多來自各帝國大學東洋學科出身，從事「土地調查、舊慣調查」等業務。⁸² 也就是說，東洋學加入了實際對中國的調查，相關研究者多半會注重區域研究以及田野調查。另一方面，京都學派對中國的考遊傳統，也要求認識「實際中國」，在之後融入民族學、人類學、田野社會學之後，也增添了這部分的研究業績。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版圖重新組合，日本所提出的亞洲觀念，在實際操作上，也是以區域研究者為核心所組成的。區域研究到亞洲學的系譜，提倡將亞洲作為空間認識，以客觀研究為核心，同樣是把中國當作一種「對象物」的理解。

(三) 如何在觀念史的立場上重新評價戰前東洋學？

以「東洋文庫」為例，從1924年創設，最初由白鳥庫吉擔任研究部長，初期的研究員有池內宏(1879-1952)、加藤繁(1880-1974)、津田左右吉(1873-1961)、羽田亨(1882-1955)、原田淑人(1885-1974)五位研究員，⁸³ 就代表了戰前以文哲為主的研究形式。1947年第二次大改革，建立近代中國研究、宋代史研究、近代日本研究、伊斯蘭研究、西藏研究等整合性研究、特定性研究。到2003年第三次大改革，新研究體制以現代中國研究與現代伊斯蘭研究為支柱，成為專案

⁸¹ 在市村瓚次郎《東洋史要》與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中，都強調了地理、氣候對文明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參見市村瓚次郎編：《東洋史要》，頁2-3。

⁸²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8。

⁸³ 佐藤次高著，邵軒磊、劉晃銘譯：〈日本東洋學的成立、發展與東洋文庫〉，《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97期（2011年6月），頁5-7。

型的「跨場域亞洲研究」，以亞洲各地為對象，進行的基礎歷史、文化研究組成。這三次的變遷，將中國由抽象到具體，具體而微的說明了本文的主軸，也最足以代表東洋學的變遷狀況。

在學術現代化過程中，從儒學到東洋學的轉換中，試圖建立客觀視角與理論，具體表現在「史略到通史」的改變。這一點對於日本國內本身而言是學術近代化；而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而言，正是學科全球化的事例，歐洲史學與日本社會結合，成為研究工具之後，又反過來體現出日本東洋學的特殊風貌，「東洋／西洋／日本」是日本非常特殊的世界觀。在世界觀意義上，是把儒家以禮教為核心的「天下」轉變為以地理為核心「亞洲觀」；也就是試圖把主觀文化世界觀轉為客觀空間世界觀。

東洋學對於戰後中國研究的主要影響，體現在強調時間的史觀研究；以及強調空間的國情研究。雖然如第一節先行文獻中指出，東洋學的建立具有將「中國他者化」的性質，但在仔細檢閱研究成果之下，發現有作為「對象物與對照物」兩種他者典範，這兩種典範在戰後分別成立了不同的研究理念（問題意識）系譜。雖然這兩種分類在初期並不明顯，但隨著學科演變，在戰後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兩套系譜。若以「觀念史的角度」追其本源，本文提出將東洋學具有「對象物與對照物」模型。這個模型試圖賦予了東洋學在觀念史上的定位，同時也期盼對於觀念史研究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研究方式。

（責任編輯：曹庭瑄）

徵引書目

- 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 小倉芳彦：〈日本近代史学の再探討〉，收於荒松雄等編：《岩波講座世界歴史》，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30卷。
- 山田利明：《中国学の歩み——二十世紀のシノロジー》，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年。
- 仁井田陞：〈我が国における東洋学研究の特色——東洋文化研究所〉，《學術月報》第7卷第8期，1971年11月。
- 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内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第2卷。
- 戸川芳郎：〈漢学・支那学・中国研究〉，《中国中日関係史研究会会刊》1990年第4期。
- 王屏：〈論日本人的中國觀的歷史變遷〉，收於蔣立峰編：《中日兩國の相互認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
- 加藤繁：《支那古田制の研究》，東京：有斐閣，1916年。
- 市村瓚次郎、滝川龜太郎：《支那史》，東京：吉川半七出版社，1888年。
- 市村瓚次郎編：《東洋史要》，東京：吉川半七出版社，1887年。
- 末廣昭：〈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收於末廣昭編：《「帝國」日本の学知：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帝国」日本の学知》，東京：岩波講座，2006年，第6卷。
- 白永瑞：〈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9期，2005年9月。
- 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説の研究〉，《東洋時報》第131期，1909年8月。
- 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第4期，2006年8月。

- 石之瑜、高國鼎：〈作為異己的主權中國——東亞本體論的可能性與可能性的東亞本體論〉，《政治科學論叢》第15期，2001年12月。
- 伊藤一彥：〈日本の中国研究〉，收於安藤正士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
- 吉川幸次郎編：《東洋学の創始者たち》，東京：講談社，1976年。
- 安藤彦太郎：〈中国研究の問題点〉，收於安藤彦太郎編：《日本人の中国観》，東京：勁草書房，1971年。
- 佐藤次高著，邵軒磊、劉晃銘譯：〈日本東洋學的成立、發展與東洋文庫〉，《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97期，2011年6月。
- 尾藤正英：〈歴史理論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第81卷第5期，1972年5月。
-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東京：中央堂，1888年。
- 里井彦七郎：〈昭和史論争と中国問題〉，收於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之水書房，1966年。
- 和田清：〈東洋学のために〉，《學術月報》第7卷第7期，1954年10月。
- 青木富太郎：《東洋学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東京：螢雪書院，1940年。
- 倉石武四郎：《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発達》，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
-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
- 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東京：大日本図書，1898年。
-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学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
- 陳瑋芬：〈自我的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與「支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2001年3月。
- 飯島忠夫：〈漢代の曆法より見たる左伝の偽作（1）〉，《東洋學報》

第2卷第1期，1912年1月。

飯島忠夫：〈漢代の曆法より見たる左伝の偽作（2）〉，《東洋學報》

第2卷第2期，1912年2月。

黃俊傑：〈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收於黃俊傑編：《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傳統〉，收於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年。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藤井讓治：〈三浦周行〉，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

藤原定：〈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中国研究》第1期，1947年7月。

礪波護：〈序〉，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